

〔联邦德国〕瓦尔特·瓦内马赫尔著

第二次世界 经济危机

何乃华 译
吴际坤 校

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

〔联邦德国〕瓦尔特·瓦内马赫尔著

何乃华 译

吴际坤 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Walter Wannenmacher

Die zweite Weltwirtschaftskrise

根据德意志出版公司1983年版译出

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

〔联邦德国〕瓦尔特·瓦内马赫尔著

何乃华译 吴际坤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875印张 172,000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20册

书号4111·186 定价1.90元

译者说明

我是一名从事对外经济工作的干部，近两年多来被派往国外的合资公司工作，从而现实地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经济机体内部。为了比较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经济，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以便做好工作，我曾与各方面的人士进行探讨，并翻阅大量资料。

瓦尔特·瓦内马赫尔的《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作者并非空谈理论，而是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乃至心理学的角度，列举出一些实例来论证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他的结论是：

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危机（1929年至1933年）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从1982年开始，已经进入了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而且这次危机被向后推移的时间实在太长久了。因此估计它将会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

作者认为：“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中心归宿点。”因此，他围绕着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主要层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消费心理、储蓄倾向、消费信贷、转帐户头、私人投资、企业经营、税收情况、货币与资本、银行运作、证券交易、欧洲美元、石油美元、劳务出口……。通过这

些，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状态以及运作方式。

瓦内马赫尔并没有完全回避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中的各类矛盾，对选举、劳资关系、缩短工时、工会的作用、社会动乱、科技发展对就业的影响、青年问题、黑社会问题乃至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等问题，均有所论述。这又可以使我们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状况有所了解。

以美国和联邦德国的情况为主，作者引证了大量历史和近期的资料及统计数字，分析了政府所奉行的经济政策，尖锐地指出：造成这次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各国政府；它们所奉行的赤字政策是“伪币制造”，是“骗局”。作者认为，今天的所谓“福利”，实际上在“损害未成年一代人的利益”。他指出：

“如果政府继续在沉默的多数面前骗取信贷，经济危机很可能会发展成为国家危机。”

作者还介绍了新凯恩斯主义、供应学派、货币学派、市场控制论、预算学派等西方经济学流派的主张，并着重分析了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

作为一名资产阶级学者，瓦尔特·瓦内马赫尔尽管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并预感到了将会产生的结果。但是他毕竟无法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本质所在，因此只能从政策方面兜圈子。他怀念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所谓“黄金时代”，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所谓“自我治疗”；在文章结尾时，空泛地期待着“能够重新找到一种诚实的经济政策，并以此继续维持下去。”

在“南北关系”上，作者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制成品进入国际市场，危害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所

谓“援助”，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仅仅根据东欧国家的一些片面情况，他就武断地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类似的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将斯大林同志与拿破仑相提并论，更是无稽之谈。

为了追求文章本身的商业价值，资产阶级学者著书用词时，往往耸人听闻，甚而故弄玄虚。本书中的某些词句亦难脱此窠臼。

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我国西欧经济学会副会长杜厚文同志和我的母校——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德文教授赵润同志的鼓励，同时受到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全书是1983年8月至11月陆续翻译完稿的。当时合资公司正进行收尾工作，后期我又到德国珠宝学院进修，时间十分紧张。另外，本人水平确实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何 乃 华

1984年6月

作者简介

本书原著作者瓦尔特·瓦内马赫尔 (Walter Wannenmacher) 是联邦德国较有影响的经济评论家，出生于1902年。大学毕业后，即成经济专业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了大量文章，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1956年，〈基督与世界〉杂志问世。他是创立人之一，并担任经济版主编。他经常撰写经济评论，并出版了不少专著。

本书是他最新的专论著作，1983年在联邦德国出版。

原著序言

本书于1979和1980两年写成，1981和1982两年只不过补充了一些现实材料。这一事实表明，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是可以预见的，人们只须对已经在几年前就可以触及到的因素进行一番分析。不过，进行分析时，须抛弃主观的愿望和想象。在当时那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吹自擂的时期，人们只相信那些与自己的愿望一致的说法。首先是那个被奉为“科学”的神话，即经济景气可以通过加油器与刹车板予以控制。在这一神话的标榜下，“经济”之车被驶进了泥塘。今天人们开始认识到，“加油”不能使车子顺利行驶。于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又重现了，即对“怎么办”这一问题，只能给以令人很不愉快的答案。因为人们自吹自擂了四分之一世纪，现在不可能回避其恶果。但是人们即使在高度尴尬的环境中，仍然不愿放弃相信奇迹。因此乌托邦式的论调现在比任何时候均易于找到市场。作者没有这类货色提供，与之相反，他不得不打破某些幻想。这并非是为了使读者垂头丧气，而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点启示，以便他们采取现实的处世方式。

目 录

1	家兔原则.....	1
2	钱和资本.....	21
3	单行道.....	40
4	危机是如何造成的.....	55
5	“时代精神”.....	68
6	加速着的非道德化.....	79
7	与风车轮作战.....	93
8	变换药方.....	106
9	资本主义的非资本化.....	121
10	人和机械主义.....	141
11	假象.....	156
12	换马术.....	169
13	前景.....	183
14	自我治疗的力量.....	202
15	通往不可治理的道路.....	218
	译者注释.....	235

1 家兔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危机被“铲除”了。如果认为危机可能出现，则被视为落伍。人们认为，现代景气政策的成就，将会阻止一切危机。如果重要的经济指标曲线呈下降趋势，人们就说是“衰退”。根据可比较的数据来看，统计图表虽然与1873、1890、1900以及1907年的危机基本上一样，但是人们只承认从1929年到1933年是一次真正的危机。而且普遍认为，这种危机不会再重现了。于是人们一致公认，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两个季度未能达到前一年的水平，就算是一次衰退。1981至1982年度，几乎大多数工业国家——日本除外——均出现了这种状况。因此，可以说是一次世界性的衰退。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时期，危机已进入第二个年头，人们仍然拒绝使用危机这一字眼。人们尽其所能拖延时日，以回避令人不愉快的真理。一谈到经济问题，人们就习惯于将自己置身于社会产值的计算之中。本书将远远抛弃这种耸人听闻的造作。因为所有国家的社会产值计算中均充满了不精确的因素。尽管有统一的调查的尺度，但从国际范围来看，根本无法相互予以比较。因为各个国家不精确因素的活动范围大不相同。如果能够找出一个不精确因素的常数，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也只能提供一个可能的方向。即使在这一前提条件下，也会出现大量错误的注释。

这里仅举两个例子：1980年第三季度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1979年第二季度完全一样，即14720亿美元。1980年第三季度的失业率是7.5%，而1979年第二季度是5.6%。以精确调查失业为据的统计，表明经济情况严重恶化了；而很大程度上靠估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所得到的结论，却与此完全相反。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81年第三季度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2238亿马克，与前一年同期几乎一致（2233亿马克）。这一季度就业人数按精确调查的数字比前一年同期减少了20万人，而工业生产统计也呈现1.3%负值。这一情况也说明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会将人们引入歧途。以此为基础所做出的判断至少是不确切的。

经济毕竟不是为统计员消磨时间而存在的，经济应为人类提供食品、衣着、住所以及娱乐。如果我们承认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中心归宿点的话，那么就不应该以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单位为尺度，而应该以使人们舒适地生存的价值，使人们充满希望或使其担心害怕的价值为尺度。如果民意测验能够月复一月地提供可比较的结果的话，本来可以为我们在在这方面提供十分良好的服务。但是民意测验往往按不规则的时间顺序来进行，问题的提法又往往有很大差异，因此其代表性很值得怀疑。

看来只有失业统计可以作为准确判断的基础。当然在这一统计中，无法区分失业者和不愿就业者。不管怎么说，只要失业增加，就可进行如下的推论，公众利益在经济上受到了损害，这里或者那里对就业的担忧增大。这一切对人们的生活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反之，人们可以从失业人数的减少推论到经

济的恢复。

回顾一下1981至1982年度，必须承认所有工业国家的失业人数都增加了。在这些国家，大约有3000万人没有工作。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平均失业率基本达到了1930年危机时德国的水平。当然将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时的失业情况与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失业情况进行对比，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因为那时的统计是按照另外的调查方法进行的（比如寻找职业者是按工会成员或承担失业保险者的百分比）。我们假设1982年联邦德国的平均失业人数为160万人，这一状况比其他工业国家还要好得多，首先比美国、英国以及法国要好得多。1929至1933年危机时期的1930年，当时德国年平均失业人数是310万人，而当时德国的人口比现在的联邦德国人口整整多出10%。

如果不考虑外籍工人，理论上联邦德国可说是充分就业。怎么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呢？1961年联邦德国拥有70万外籍人，1974年人数增加到410万，其中230万受雇于人。1979年，当失业曲线已呈上升趋势时，受雇于人的外籍人仍然有190万，远远超过失业人数。

六十年代是德国经济蓬勃增长的时期。在经济景气顶峰时期，工业生产净指数呈现出创纪录的增长率：1964年7.9%，1968年12.8%，1973年6.8%。此后增长率刚好能够弥补前一年的下降幅度。但是1980年和1981年增长率是负值。六十年代，人们从世界各地招聘工人。二十年后，只要有办法，人们就想把他们甩掉。

很明显，这些外籍人——以及德国失业者，是一个谬误的牺牲品。谬误就在于，人们以为德国工业生产的增长永无休止。

“树不可能长到天上去。”这句老话用控制论^[1]的行话可以这样说：任何一种有机增长中均存在回动离合器。回动离合器在个别机体情况下，意味着停止增长以及最后导致死亡。在群居生活的组织里，意味着群居成员数目的减少而导致结构的变化。我们假设，对在一个特定的场所生存的家兔的数目，每年均进行统计。将所统计的数值按坐标绘成图表，于是得出一条可供分析的曲线。按照曲线进行预测，应该可以预见，在这个场所，在X年后将生存几十亿只兔子。但是这个预见是错误的。因为在某一未能预测的年份里发生了传染性兔瘟，使兔子大批大批地死亡。只有一些对病毒有抵抗力的兔子活了下来，这种动物的种类也就保存了下来。

在这里，人们不能毫无战栗地去想象世界人口增长的曲线。人类将会和家兔同命运吗？这里无须探讨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只想利用“家兔原则”来解释经济的起伏。国民经济必须增长，这一观点近几十年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变成了供祈祷的偶象。如果出现一次停止增长，人们就感到愕然，根本不去想一想，无休止的增长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尽管社会产值计算不准确，增长数据亦应与就业人数的增长或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劳动成果亦应找到接受者。在模拟状况下，人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些因素自行变化，那么它们之间将会保持一定的平衡状态。实际上，这种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这一过程是在市场上演变的。一个市场是这样的一个场所，供应方和需求方尽管均想在其中占便宜，但必须通过交易达成一致。交换是以双方均作出某种妥协为前提条件的。供应方不能按他想要的高价出售，而需求方不能按他想出

的便宜价格购买。由于其他供应者和需求者经常难以捉摸地出现，于是就形成了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双方妥协。

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妥协与自我放弃几乎是同义词。他必须敢于去取胜。在经济史上，人们很难找到那种经过一段时间没有最后走向生产过剩的产品。准备妥协的市场参与者是达到某种平衡的先决条件。在竞争的压力之下，一方不能过多地占对方的便宜，这的确是理想状态。一旦达到某种平衡，所有市场参与者均致力于打破平衡。因为他们相信借此可以得到实惠。而这种实惠往往是短暂的。与理论模型相反，在实际的国民经济生活中，平衡状态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而且市场生命脉搏于不平衡之间，容易走向极端。极端中则存在着回动离合器，以使迄今为止的发展改变方向。

强大的企业不断吞食弱小的企业，一直到实际的、而非所期望的销售增长使他们失望，并将其自身的扩张引向了反面。从林中弱肉强食的过程，一直延续到强者们因食物短缺而大规模自相杀戮。此时，巧于吞食的强者才能繁殖，回动离合器发挥了作用。因为市场遵循丛林规律，因此社会主义^[2]理论家对其始终深恶痛绝。尽管看上去十分矛盾，不是在这儿，就是在那儿，社会主义的实践却必须为市场提供活动场所。谁要想在莫斯科不通过排长队买到一磅肉，他就必须到黑市上去。实际的活人并非象社会主义所塑造的典型那样。对这一事实感到愤慨的人们却不能否认，他们自己也是以最方便、最便宜的方式去获得肉食。至于机械化养鸡还是人工饲养的小牛，则无须考虑。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工业国家的人口增长不大，以“过时的”生产条件养活他们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争夺顾客的斗争迫使

人们追寻“先进的”生产条件。可是现代化生产方法不断导致生产过剩。于是这一竞争就变得更加残酷无情。人作为买主，迫使商品提供者相互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成本较高者被淘汰掉。这正如丛林中牙齿不够坚利的野兽被淘汰掉一样。谁能够使用更先进的生产方法，谁能使周围的人付出最有效的劳动，谁就能够生存下来。一句话，成本最低者，生存机会最大。居于顶端的是最有成效的人类剥削者。这一点，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什么两样。因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其领导成员的奖励，是按他们从其属下所激发出来的工作效率而发放的。直到如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可以阻止人剥削人的体制。没有剥削者——这一有用的恶魔——还不行。这一点一再得到证实。

在东方^[3]，恶魔被套进了计划官僚主义之中。他们的活动空间被限制到最低点。除了激发下属更有效地工作之外，他们再也不允许起更多的作用。为了获取奖赏，他们以或多或少的成绩来诈取计划的完成。这就是他们对整个经济体制所能施加的全部影响。因此，如果他们的成绩大，就会出现供应方面的困难。最近在波兰所出现的使人吃惊的状况就是如此。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所内含的缺陷，首先可以由其生产率的低下予以印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过剩，恰恰是前者的对照。在这里，恶魔支配众多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又受丛林规律的支配。丛林规律的作用，至少一直到国家必须以提供贷款担保，或提供资助进行挽救性的干预为止。企业拥有生产能力、交通运输能力以及分配能力，而这一切在他们的簿记上均以固定资本投资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需求增加，竞争的压力就减轻，钱也好赚，而利润中的巨额数目可以作为固定资本折旧^[4]

而挪走。因为人们往往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解释未来，而需求增加又是如此惬意的事情，于是就被看成为持久的现象。而那些最大企业的董事会也是由人来组成的。于是，通过折旧所获得的钱——很可能还有贷款来的钱，均被利用来进行投资。投资，即使是用于合理化措施的投资，终将会扩大生产能力。

生产能力扩大即可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这一论点的诱惑力极大。谁首先掌握这一条，就可赢得竞争优势，从而将行动迟缓的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弱肉强食”，这是丛林中的规律；同时，也是自由市场上的规律。

投资使人有就业机会，社会收入因之增加，从而也使消费需求上升。经济繁荣的上升时期，很难注意到：单位产品成本最高的、最弱小的竞争者，被迫抛出了手绢^[5]。但是，很快生产力的增长就大于需求。因为大多数的企业家，根本不去考虑“家兔原则”。他们完全信赖市场分析。而市场分析的作者们，不愿使他们的雇主倒胃口。因为作者们不愿失去雇主，从而打破自己的饭碗。

分析总是由过去的情况推断未来。于是，对迄今为止的需求增长似乎起推动作用的数值，进行了调查研究。为什么说“似乎”，因为在无穷的数值中，只有极少数有参考价值。所以，人们使用其他外推数值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又用这些不确切的数值予以调整。其结果是，即使经济情况已呈现衰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分析的结论仍是：需求的增长将持续下去。

事实上，根本无法确定增长曲线何时会急转直下，无法确定回动离合器何时发挥其功能。如想确定这一点，必须掌握全世界同一行业中，所有企业的真实的生产计划。此外，尚须尽可

能精确地掌握反映消费者与供应增长对抗的情况。因为消费者的动态，恰恰是回动离合器的起动点。

如果顾客是众多企业，那么回动离合器很快就會发生作用。因为只要发现供应者之间的竞争加剧，他们就立即控制需求。在此之前，即使价格上升时，他们也要超出实际需求进货，因为库存商品暗含着利润的增加。事后证明，导致生产扩大的需求中，有一部分是虚假的。由于已扩大了的生产所形成的压力，价格开始下跌，用户立即采取著名的“*hand to mouth buying*”（英文：“现吃现买”）。他们对因高价购进的库存所产生的折旧表示担忧。于是尽全力削减库存。从而众多的供货者不得不大幅度地限制生产。本来期望通过扩大生产降低成本。事与愿违，因开工不足反而使成本加大。最不经济的设备停止使用，生产能力萎缩，紧接着出现失业——与家兔原则相吻合。

如果顾客是个人，即最终消费者，回动离合器则很晚才能发挥效能。原因是，人们的收入不稳定，而耐用消费品已经达到超饱和的程度，并且人们改变了消费习惯。过去，公众缺乏通货膨胀的经验。价格构成一旦发生变化，回动离合器很快就发挥其作用；为了达到消灭竞争对手的目的，成本最低的生产者降低售价。此时，消费者却认为，等待更便宜的商品更为合算，于是停止购货。

通货膨胀却将这种消费心理一扫而光。具有通货膨胀经验的人明白，买东西时犹豫犹豫没有任何好处。今天就将明天才用得着的东西买下来是非常合算的。因为很多人昨天已把今天要用的东西买好了，所以根本不再购货了。此时，回动离合器才开动。需求的上升被认为是真正的消费，而不是投机性的预先采购，从这样的前提条件出发而制定了有关生产能力安排的计